

论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实践、困境与出路

——以民族主义的视角^{*}

陈 纪 郑 静

内容提要 现今,叙利亚国内战乱不断的主要根源在于其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大叙利亚民族主义严重地阻碍着叙利亚的民族国家构建。鉴于此,本文详细地阐释了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本土化实践,着重从泛化的民族主义及其负面的政治效应深入剖析其民族国家构建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力图为之重构提供一种可能的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词 叙利亚 民族国家构建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大叙利亚民族主义

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浪潮席卷了整个中东世界。叙利亚15名孩童受此影响在德拉的墙壁上写下当时流行的革命口号“人民希望政权倒台”,结果被政府逮捕。以此为导火索,叙利亚爆发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并遭到当局的暴力镇压,已演变成现今的内战。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的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3月已有353900人死亡,其中包括平民106000人,有56900人失踪。^①叙利亚历史上就是一个战乱频发、政权不稳的国家,经济、宗教、部落、族群、阶层等问题重重。时至今日,叙利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可怕的内战?或者说,叙利亚发生内战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国外学术界关于叙利亚发生内战的原因主要从种族、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较多的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种族和宗教是叙利亚人身份认同和群体效忠的对象,^②以及那些社会精英对各自主张的意识形态的适应与偏好等,^③导致了其内战不断。部分学者虽然强调哈菲兹·阿萨德和巴沙尔·阿萨德(以下分别简称哈菲兹、巴沙尔)父子对叙利亚本土认同的塑造与强化,^④但是,叙利亚国内各种反对派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国内有学者从历史发展脉络角度探求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⑤但专门研究叙利亚内战及其产生原因的成果则并不多见。

通过分析和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笔者认为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是导致叙利亚内战得以产生的主要根源。鉴于此,本文详细地阐释了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本土化实践,着重从泛化的

^{*} 本文系2018年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京津冀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政府协同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AS1803)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课题研究专项经费资助。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王战涛《叙利亚7年内战死亡人数估计超过35万》,13/03/2018,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3/11660774.html>

② 参见 Eliott Rousseau,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oreligious Identity Groups in Syria: Loyalties and Tensions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in BSU Honors Program Theses and Projects, 2014, Item 66, http://vc.bridgew.edu/honors_proj/66

③ 参见 Gilbert and J. Victoria, *Syria for the Syrians: The Rise of Syrian Nationalism, 1970 - 2013*, Master's Thesi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013.

④ 参见 Eyal Zisser, “Who's Afraid of Syrian Nationalism? National and State Identity in Syr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2, 2006, pp. 179 - 198.

⑤ 王霏《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民族主义及其负面的政治效应深入剖析其民族国家构建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力图为之重构提供一种可能的未来发展之路。就是说,如何解决由那些泛化的民族主义而造成叙利亚人的民族国家认同脆弱问题,如何重新构建叙利亚本土化的民族国家,应当是消除其国内动乱及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有效路径。

一、哈菲兹与巴沙尔执政时期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本土化实践

自哈菲兹执政之日起,叙利亚开始转向本土化的民族国家构建,巴沙尔在继承其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遗产之后,曾经采取多种举措,力图促进叙利亚人强化现有疆域范围内的民族国家认同。但是,由于国内反对政府派所主张的非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占据主流,使得这种本土化的民族国家构建以失败告终。

(一) 哈菲兹执政时期的民族国家构建

一是努力推动叙利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哈菲兹执政时期,叙利亚接受大量来自阿拉伯产油国和美苏的援助及经济技术合作,同时政府放松对经济尤其是对外汇及私人、外国投资的管控。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叙利亚每年从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国家获得大笔资金,仅从沙特阿拉伯得到的援助就高达十多亿美元。^①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叙利亚和以色列为争夺戈兰高地僵持不下,在基辛格穿梭外交的努力下双方达成了脱离战争的协议,随后于1975—1979年间,美国共向叙利亚提供了4.38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等援助。^②并且,美国和苏联的企业公司也在叙利亚投资,兴建工矿产业。这些举措促进了私人投资和民族资本的大量回流,促进了叙利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府继续放宽对经济的管制,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效果,国力逐步增强。

二是以务实的外交提高叙利亚的国际地位。作为极具外交天赋的政治家,哈菲兹一方面鼓吹“阿拉伯民族主义”,表明其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同时以一种大叙利亚民族主义的立场对黎巴嫩事务大加干涉。另一方面,本着为国家利益考虑的务实立场,他逐渐缓和与苏联、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例如,1980年,叙利亚与苏联签订了《叙苏友好条约》,与之结成了盟友。在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中,叙利亚又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选择支持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中,叙利亚参与美国领导的反伊拉克联盟,拉近与美国的关系。这些外交方面举措或提高了叙利亚的国际地位,或维护了叙利亚的国家利益,客观上强化了叙利亚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存在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内民众对叙利亚的国家认同。

三是从族群、教育、文化等方面试图培育国家层面的民族认同。在族群方面,哈菲兹政府积极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强调所有族群的阿拉伯民族身份,集中表现在处理库尔德问题上。将长久生活在叙利亚地区的库尔德人迁移到阿拉伯人聚居区,将阿拉伯人迁徙到库尔德人地区,加速彼此间的交流与融合。在教育方面,大力建设由国家控制的现代世俗教育体系。20世纪70、80年代叙利亚教育预算占政府财政预算的13%—20%,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1972年为2.66亿叙镑,1981年增至29.68亿叙镑。^③在文化方面,灌输前伊斯兰历史及其连续性,主张叙利亚所在地是孕育阿拉伯历史文化的摇篮,强调叙利亚在阿拉伯历史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哈菲兹执政前,叙利亚先经法国委任统治,随后经历各种军事政变和体制改革,国力不振,缺乏

① 王新刚《20世纪叙利亚: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的嬗变》,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② 王新刚《20世纪叙利亚: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的嬗变》,第180页。

③ Moshe Ma'oz and Anver Yaniv, *Syria Under Assad, Domestic Constraints and Regional Risks*, London: Croom Helm, 1986, p. 41.

强化国家认同的现实基础。在他的领导下,叙利亚的独立地位显著提高,从一个脆弱且不稳定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谋求地区有影响力的“地方霸权”国家。^①经济快速发展和外交地位增强让叙利亚本土化的民族国家意识得以强化,每个叙利亚人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国家公民身份。社会文化层面也悄然体现着这样的变化,如叙利亚的安达卢西亚音乐从最初的表达泛阿拉伯情绪的有力工具,逐渐变为与现代叙利亚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相结合的音乐流派,^②一个叙利亚文化共同体正在浮现。

(二) 巴沙尔执政时期的民族国家构建

巴沙尔上台后,在继承其父政治遗产基础上继续推行改革。政治上,放松对国内言论自由的管制。当时叙利亚国内各种论坛纷纷涌现,形成了对国内事务激烈讨论的氛围,被西方称赞为“大马士革之春”。经济上,继续推行改革,学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巴沙尔于2005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保护重点国有经济部门,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外交上,延续了哈菲兹执政时期的务实做法,稳定与美国的关系。例如,2003年,巴沙尔政府反对美国武力打击伊拉克,在外交上与埃及、沙特、英、法等国家展开积极合作,努力阻止战争,但同时又应允了美国提出的要求,不庇护美方通缉的伊拉克人,封锁边界,以及对国内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办事处采取强行关闭等。

巴沙尔政府期望通过宣扬叙利亚的历史、文化、象征符号等国家理念,强化叙利亚本土化的民族国家认同。具体而言,一方面,他本人在多种场合强调叙利亚自身具有独有的历史和文化,继续凸显阿拉伯民族属性,期望塑造叙利亚人具有阿拉伯民族属性的身份。但这同时也唤醒和助长了泛阿拉伯主义在社会中的蔓延。并且,他在1998年创办了一个名为叙利亚计算机协会的网站,发表以叙利亚人为中心的大量言论。^③此外,通过强调叙利亚与罗马帝国之间联系,宣扬叙利亚所在地处于阿拉伯历史文化的摇篮地位,突显其历史文化发展的主体性,以此力图激发叙利亚人对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认同。^④

另一方面,巴沙尔政府运用一些象征符号促进叙利亚的民族构建。例如,地图具有强大的国家象征意义,能够强化内部各族群之间的共同想象。在政府宣传海报中,年轻的巴沙尔选择以本土化的叙利亚国家地图为背景。这张地图作为象征,展示了人们对于国家合法边界的看法,被精英故意选择和复制来强化人们的这种认同。^⑤地图这种象征符号明显带有强烈的叙利亚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色彩。再如,国旗也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旗帜无论是否被消费者注意到,都会给观众带来心理效应,通过引导他们理解国旗所传达的价值取向来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⑥事实上,巴沙尔本人十分愿意将自己与国旗结合起来,以塑造、传达象征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

(三) 叙利亚内战: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

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战火延续至今。这标志着哈菲兹和巴沙尔父子用几十年时间构建的这种脆弱的民族国家认同最终走向全面瓦解。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叙利亚人的

① Eyal Zisser, “Who’s Afraid of Syrian Nationalism? National and State Identity in Syria”, pp. 179 – 198.

② Jonathan H. Shannon, “There and Back Again: Rhetorics of Al-Andalus in Modern Syrian Popular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8, no. 1, 2016, pp. 5 – 24.

③ 参见 Eyal Zisser, “Who’s Afraid of Syrian Nationalism? National and State Identity in Syria”, pp. 179 – 198.

④ Bashar Al-Assad, “President ASSAD Welcomes POPE JOHN PAUL THE SECOND” 05/05/2001, http://www.presidentassa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35:president-assad-welcomes-pope-john-paul-the-second-may-5-2001&catid=107&Itemid=496

⑤ Batuman, Buent, “The Shape of the Nation: Visual Production of Nationalism Through Maps in Turke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9, no. 4, 2010, pp. 220 – 234.

⑥ Butz, A. David “National Symbols as Agents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0, no. 5, 2009, pp. 709 – 804.

民族国家认同依然十分脆弱。”^①叙利亚作为存在了70多年的政治实体,其独特的国家认同在哈菲兹和巴沙尔执政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但是,由于叙利亚在阿拉伯历史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以及历史记忆上的大疆域等价值理念在国内多数族群那里根深蒂固,以及他们所遭遇的诸多现实问题未能有效地解决,结果导致泛化的民族主义在国内民众中形成了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虽然哈菲兹和巴沙尔本人也意识到泛化的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构建构成了威胁,但因自身及其所在的种族利益牵制,同样也难以脱离阿拉伯主义的藩篱。巴沙尔本人不得不承认:“我们比上一代更认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②

泛化的民族主义直接体现为叙利亚国内反对政府派众多,彼此间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调和。当前,反对政府派主要包括力图建立西方式民主国家的世俗反对派;以伊斯兰教作为行动指南的伊斯兰分子武装组织;以《古兰经》作为治国原则并排斥什叶派的萨拉菲分子武装组织;鼓吹“圣战”、推崇暴力的圣战分子等四大类。^③这些反对政府派所持有的政治主张,大多是泛化的民族主义与族群或宗教教派相结合的产物,由此也反衬出叙利亚国家民族主义的弱化。总之,叙利亚国内多数民众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泛化的民族主义的影响,由此所引起的各种政见多元的且紧张的族群关系,导致其民族国家构建的最终失败。

二、泛化的民族主义及其政治效应: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现实困境

泛阿拉伯主义和大叙利亚民族主义是叙利亚国内当前依然存在的两种泛化的民族主义。虽然哈菲兹和巴沙尔父子力图加强本土化的民族国家构建,但这两种泛化的民族主义在多数叙利亚人的心目中从未消失过。它们从根本上否定了其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正当性,以及其在多数民众中产生的负面的政治效应,构成了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现实困境。

泛阿拉伯主义是在15世纪发端于新月地带,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特征的一种思想形态。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大肆宣扬阿拉伯历史文化,并把语言和历史作为阿拉伯人文化认同的核心,由此奠定了阿拉伯民族觉醒的思想基础。19世纪,该地区知识精英开始接触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在奥斯曼帝国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以及在对阿拉伯未来走向的思考中,这种文化民族主义逐渐演变成政治民族主义。其中,萨提·胡里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代表,主张“民族比祖国更广泛,比种族更大,比国家更有意义”。^④泛阿拉伯主义催生了叙利亚人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的诉求,并在社会精英的带领下开展了一系列抗争。1946年法国军队撤出叙利亚后,标志着叙利亚实现了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1946—1958年,在阿拉伯社会党和复兴党的大力推崇下,泛阿拉伯主义达到顶峰,成为占据国家主导地位意识形态。1961年因纳赛尔的专制统治使泛阿拉伯主义主导下的民族国家构建失败,但这并不代表这股思潮的败退,复兴党又借着这股思潮从1963年开始逐渐消灭了所有政敌,并设法夺取了叙利亚的政权。^⑤他们对泛阿拉伯主义的强调成为制约当前叙利亚本土化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障碍。

在法国殖民以前,叙利亚在地理范围上包括当今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以色列,被称之为沙姆地区。这种历史记忆上的大疆域是大叙利亚主义得以形成的民众基础。起先,它广泛

① Dilshad Muhammad and Filiz Katman, “Nationalistic Trends in Modern Syria”, *European Researcher*, vol. 94, no. 5, 2015, pp. 373–380.

② 转引自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

③ Elizabeth O’Bagy, *Jihad in Syria*,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September, 2012.

④ S. G. Haim, *Arab Nationalism: a Anthology*, Berkeley Calif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228.

⑤ Dilshad Muhammad and Filiz Katman, “Nationalistic Trends in Modern Syria”, pp. 373–380.

地存在于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民众之中,宗教认同感十分强烈。后来,因为该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信仰基督教的民众在借鉴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之后,开始倡导一种地域模糊的大叙利亚认同。最后,通过淡化宗教意识将那些占据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吸纳到这种认同之中,逐渐形成了以原先疆域范围为基础的大叙利亚民族主义。沙姆地区相对于阿拉伯世界有着更为相似的方言,表面上看来,它代表一种比阿拉伯民族主义更统一、更高级的文化。^① 它不承认法国统治时期划分的殖民边界,认为沙姆地区是一个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体。这种泛化的民族主义以大叙利亚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并且以叙利亚人的历史长于阿拉伯人,否定叙利亚人认同阿拉伯人的文化特征,主张在“天然的叙利亚”范围内构建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nation-state)通常是指具有一定的领土范围、建立起统一的政治体系和政府机构、具有统一的民族利益以及为国民所接受的政治文化、由本国人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现代主权国家。^② 普遍认为,民族国家成功构建的核心要素包括固定的疆域、独立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利益及由此衍生出的国族认同。然而,泛化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政治效应却制约着叙利亚民族国家的构建,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叙利亚人严重缺乏民族国家的领土意识。无论是泛阿拉伯主义还是大叙利亚主义,其所倡导的民族国家构建都不是基于已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叙利亚领土之上的,而是基于所谓的“阿拉伯世界”或“天然的叙利亚”这样的空中楼阁。两种泛化的民族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法国委任统治过程中对民众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力,发挥过积极的政治作用。就是说,它们有助于明确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身份界限,激发民众发动独立斗争,帮助被殖民者完成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构建。但是,泛阿拉伯主义和大叙利亚主义这两种泛化的民族主义在叙利亚国内至今仍然十分活跃,甚至对叙利亚移民及其后代的身份认同都产生了影响。叙利亚移民及其后代通常将自己的身份与更大的阿拉伯框架联系在一起,创建并加入叙利亚-黎巴嫩(大叙利亚)机构或阿拉伯机构,而不是单一的叙利亚机构。^③ 这显然是罔顾了该地区已各自建立了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之事实,反而是严重阻碍了当下领土范围内叙利亚民族国家的构建。

阿尔蒙德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当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与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时,政治共同体中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④ 在此意义上,泛阿拉伯主义和大叙利亚主义试图唤起叙利亚人以阿拉伯世界和沙姆地区为领土范围的准国家认同,这反过来势必会弱化他们对当下疆域范围内的领土意识,对已经独立的叙利亚民族国家认同产生抵触。一旦所谓的强大的、传统的准国家认同没有建立起来,那么现有的主权国家的合法性必然会受到质疑,带来的结果极可能引发国内动乱,破坏已建立独立主权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当前,叙利亚内部存在的这两种泛化的民族主义消解着叙利亚人对当下民族国家的领土意识和国家认同,这也是引发当前叙利亚内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以阿拉伯人的民族身份替代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自从阿拉伯人走上历史舞台以来,它就一直存在,而且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它一直受到每一代人的评判。^⑤ 如前所述,哈菲兹

① J. Victoria Gilbert, *Syria For The Syrians: The Rise of Syrian Nationalism 1970 - 2013*, pp. 23 - 24.

② 王霏《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第18页。

③ Cecilia Baeza and Paulo Pinto, “Building Support for the Asad Regime: The Syrian Diaspora in Argentina and Brazil and the Syrian Uprising”, *Journal of Immigrant & Refugee Studies*, vol. 14, no. 3, 2016, pp. 334 - 352.

④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⑤ Martin Kramer, “Arab Nationalism: Mistaken Identity”, *Daedalus, Reconstructing Nations and States* (Summer, 1993), vol. 122, no. 3, pp. 171 - 206.

政府已经开始注重叙利亚本土化的民族国家构建,但是在民族属性上却始终强调的是“阿拉伯的叙利亚人”身份。同样,巴沙尔也强调叙利亚具有独特的阿拉伯历史文化,对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构建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阿拉伯属性。哈菲兹和巴沙尔父子所倡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而是以阿拉伯的历史文化强调叙利亚人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历史文化的重塑,在客观上却强化了叙利亚人对阿拉伯民族身份的高度认同。可见,借助于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大民族”文化传统,重新唤起那些已经生活在不同民族国家中人群(族群)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必然会强化这些族群对“大民族”身份的认同。

事实上,哈菲兹和巴沙尔父子对叙利亚在阿拉伯历史文化中的中心地位的过度强调,也加深了历史上具有阿拉伯历史文化特征的族群与那些非阿拉伯人后裔的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就是说,哈菲兹和巴沙尔父子执政时期试图以强势的阿拉伯文化去构建历史上所谓的“大民族”,这不仅替代了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塑造,而且也让那些非阿拉伯后裔的族群在此过程中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和同化。人口少数、文化弱势的民族成员会认为“国族”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被同化的过程,因此,铸造“大民族”的过程有可能成为促使其进一步强化国内其他族群体认同的催化剂。^①这种泛阿拉伯的“大民族”历史文化属性的强化,只会巩固那些阿拉伯后裔的族群心中的阿拉伯民族身份,并且也让那些非阿拉伯后裔的族群在面临同化的文化情境中,因自身族群体认同的强化而难以建立起对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认同。

第三,国内各族群之间的族际整合机制尚无法建立。民族国家以民族与国家有机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民族取得了国家的形式。^②而民族与国家的有机结合关键在于对国内各族群建立有效的族际整合机制。然而,哈菲兹和巴沙尔父子在推动叙利亚本土化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因泛化的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族际整合机制。一方面,对人口较多的库尔德人无法完成有效的族际整合。两届政府对库尔德人都推行“阿拉伯化”政策,采取强制性同化,剥夺他们应当具备的公民资格,限制其应享有的各种权利,从而抹杀了库尔德人对叙利亚产生本土化的民族国家认同。例如,巴沙尔政府曾经动用军队大力镇压库尔德人,使库尔德人“民族意识”日益增强,与国内其他族群间的离散化趋势愈加明显,更谈不上对之进行有效的族际整合。

另一方面,对那些人数较多的逊尼派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族际整合。哈菲兹和巴沙尔父子信仰阿拉维派,属于阿拉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并且,其家族所在的卡拉比亚族群拥有的权力最大。这一族群体几乎控制了叙利亚所有的政府部门,基本上垄断了叙利亚所有的高级军官要职。很多在民族主义浪潮下建立起来的国家中,各种部落组织、地方势力集团或宗教教派组织依然保留自己的传统体制^③,彼此矛盾重重。其在“哈马屠杀”^④以后,叙利亚国内逊尼派的中、下层与信仰什叶派的阿拉维派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此外,叙利亚其他族群也因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而产生的政见不和,同样也成为制约族际整合的又一主要障碍。对叙利亚的宗派战争进行批判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叙利亚内战和民族身份整合缺失的某种相关性。^⑤从宏观层面上看,叙利亚各族群所主张的政治立场不同,很大程度上与国内泛化的民族主义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关联。反过来说,叙

① 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

②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

③ 常士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族际合作治理——以亚非发展中国家为例》,载《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④ 1982年2月2日,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麾下的圣战武装在哈马省省会发动叛乱,攻占省政府大楼、警察局、复兴党和情报机构地方总部,杀死包括省长在内的250名复兴党干部。10天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下令实施毁灭性报复,叛乱者控制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被重炮夷为平地,具体死亡人数说法不一,约有2万人死于非命。

⑤ Christopher Phillips, “Sectarianism and Conflict in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2, 2015, pp. 357–376.

利亚国家民族主义的缺失,促使国内族群之间离散化现象严重,试图建立有效的族际整合也只能化为泡影。

三、从传统走向现代: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未来出路

泛阿拉伯主义和大叙利亚民族主义属于叙利亚原生的民族主义,发端于传统农业社会,成熟于反帝反殖民时期,显然已不适合作为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此,从总体上看,如何帮助叙利亚尽快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以及如何塑造和强化叙利亚国家民族主义,以之替代这两种泛化的民族主义,则是解决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之关键所在。具体而言,需采取以下手段推动叙利亚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再构。

(一) 打破叙利亚内部文化和社会的异质性

现今,叙利亚许多地方依然存在部族社会,并且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尤为明显。一方面因经济自给自足,社会极端封闭,缺乏横向的交往,导致叙利亚内部多数族群一直固守各自的传统文化。就是说,大多数族群并没有经历过现代文化的洗礼,各自差异较大的传统文化、宗教文化乃至部落文化仍然是他们的主体文化。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的高度封闭性使得族群之间阶层固化,社会流动停滞,彼此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例如,同一种类的族群往往从事相同的职业,职业分化与族群分层具有很高的吻合度。此外,叙利亚政府对国内族群文化的差异性和职业结构的严重分化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甚至是漠不关心。这种文化和社会的异质性,使族群各自的政治意识形态清晰化,所以难以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

叙利亚国内多数族群在面临文化差异和社会鸿沟无法获得有效弥合时,易使他们主观上愿意追随那些在民族身份和地域范围上更加广泛的民族主义,期望借此能够为族群自身获取更多的权益。就是说,叙利亚国内经济不发达,各种宗派、部落、族群文化丛生,社会发展差距大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其内部文化和社会的一致性,从而导致叙利亚国家民族主义难以在民众中生根发芽。在一个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工业文明要求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的一致性,由此催生了民族主义^①。因此,当前叙利亚应当通过大众化教育在民众中普及现代文化,发展现代工业和推动市场经济,为国内各族群创造同等的就业机会,以及扩宽社会流动渠道等诸多手段,促进其经济、社会、文化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进而言之,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转型,能够压缩泛化的民族主义生存空间,从而为叙利亚人塑造国家民族主义提供根本保障。

(二) 增强叙利亚领土范围内的疆域意识

有学者指出“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国家身份构建的基础能够强大到足以挑战土地对于国家构建的主导地位。”^②由于历史上沙姆地区受法国殖民统治,这种“天然的叙利亚”被人为划分为不同部分,因此在叙利亚后裔心中“叙利亚”所指代的地方远大于当今叙利亚的国土疆域。大叙利亚民族主义同时也意味着许多民众尤其是那些叙利亚人的后裔至今依然认为,现今的疆域是法国殖民者人为划分的,甚至不承认或否定叙利亚目前的国土疆域。并且,叙利亚建国以后大多时期仍然打着大叙利亚民族主义进行民族国家构建,这更是模糊了民众对叙利亚现有领土范围内的疆域意识。同样,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以所谓的“阿拉伯世界”为建国目标,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叙利亚国内尤其是阿拉伯人后裔的疆域意识。因此,当前叙利亚人在面临目前已经固定的国家疆域,其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任务之一应当是让民众承认这一事实,大力促进他们对现有领土的热爱和认同。

①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② Eyal Chowers, “Land-Centred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a Re-evaluation of Jewish National Revival”,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18.

有研究者认为,要全面实现和巩固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国家就不能只属于某一些人,而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或民族的所有成员,即属于全体人民。^①就此而言,大叙利亚主义主要反映了那些历史上生活在沙姆地区叙利亚人后裔的意识形态,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则主要代表了那些阿拉伯人后裔的政治价值选择。所以,在叙利亚本土化的民族国家构建中必须坚持“去大叙利亚民族主义”“去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重塑叙利亚所有族群的国家民族主义。这有助于强化叙利亚人政治边界和地理边界的统一。此外,还可以通过积极宣传和提倡使用地图、国旗、历史建筑,^②甚至货币^③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符号,同样也有助于培育叙利亚人的领土意识。研究表明,积极利用国庆日的等活动来宣扬国家领土和国家主权也是培育民族国家认同的优良选项。^④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内各族群对叙利亚疆域意识的淡化。

(三) 构建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叙利亚族群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试图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国族主义都不利于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构建。即使阿拉伯人是其国内的主体族群,但也不能仅以阿拉伯人的民族身份推动民族国家构建。在叙利亚本土化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绝对不能像哈菲兹和巴沙尔父子那样,让所有人都必须拥有阿拉伯人的民族属性。现实生活中,虽然泛阿拉伯主义在那些占据人数较多的阿拉伯后裔中根深蒂固,且在属于少数派政党的哈菲兹政权那里亦是如此,但是,当权者也不能对叙利亚国内同样占据人数较多的库尔德人,强制推行阿拉伯化抱有幻想。即使是那些人数较少的族群如果不承认自身民族的阿拉伯属性,同样也会导致叙利亚国家的分崩离析。所以,叙利亚政府当务之急应当通过制定相关制度和政策,不断塑造那些文化差异较大的族群统一认同自己作为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

从关系上看,构建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是其实现民族认同的核心,为他们增强国家认同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和情感基础。“民族”与“国家”有不同的渊源,前者是“共同体”谱系的一个分支,为个体成员提供情感归属;后者出自“统治体”一脉,核心构造是一套具有暴力色彩的政权组织系统。^⑤在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强化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培育民族文化和情感共同体,而且也需要增强叙利亚人统一的国家认同,塑造民族政治共同体。两者既有联系,同时缺一不可。同时,文化共同体的塑造(如保护历史遗产、宣扬文化民族主义)有利于实现政治民族共同体的巩固,^⑥任何一方构建失败都可能会导致民族国家构建功亏一篑。进一步讲,在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叙利亚人的民族边界和国家边界相一致,也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意涵。在此意义上,当前叙利亚必须加快完成国内不同族群间在文化、社会意义上的整合,以之构建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同时,也需要加快政治意义上的族际整合,以叙利亚国家民族主义逐步替代泛化的政治民族主义,以之构建叙利亚人的国家认同。

四、结 语

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查尔斯·蒂利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构建”是两个不同的发

① 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② 参见 Make Thatcher,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nd Historic Buildings: Preserving ‘the National Pa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4, no. 1, 2018, pp. 22–42.

③ 参见 Zenonas Norkus, “The Glory and Demise of Monetary 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mmunist Baltic Stat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18.

④ Konstanze N’Guessan, Garola Lentz and Marie-Christin Gabriel, “Performing the National Territory: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day Celebration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3, no. 4, 2017, pp. 686–706.

⑤ 张凤阳《西方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与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⑥ Mark Thatcher, “Stat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Political Leaders and Preservation Policies for Historic Buildings in France and Ital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4, no. 1, 2018, pp. 64–87.

展阶段,前者强调政权的官僚化和渗透性,而后者主张居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① 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是民族国家构建的有形手段,而“民族构建”重在创建无形的东西。^② 在此意义上,当前叙利亚国家政权建设或权力垄断薄弱,以及国家制度建设能力和民族构建不足等,都是其本土化民族国家构建失败的制约因素。本文则侧重于从民族构建角度,探讨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失败的根源。

现今,泛阿拉伯主义和大叙利亚主义成为叙利亚国内两种最为活跃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民族主义的培育与生成,意味着叙利亚民族构建受阻。就是说,泛化的民族主义模糊了叙利亚人的领土意识,塑造着具有阿拉伯历史文化属性的民族身份,以及严重地干扰了国内各族群之间实现文化、社会、政治整合。

由前述分析可知,这两种泛化的民族主义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哈菲兹和巴沙尔父子叙利亚本土化的民族国家构建失败。所以,加快叙利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通过“去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去大叙利亚民族主义”推进其国家民族主义构建,是目前重构叙利亚民族国家最为紧要的现实问题。并且,在具体手段上,需不断提升叙利亚国内文化和社会的同质性,增强叙利亚人的疆域意识,以及强化其民族身份和民族国家的认同等。除此之外,当前尚需要为这些具体手段提供重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

一方面需要实现叙利亚国内各族群共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发展叙利亚经济不能像哈菲兹和巴沙尔父子那样,仅仅是为了那些强势族群获取或分享利益成果,而应当是保障叙利亚弱势族群实现利益共享。当前,叙利亚政府应通过发展各族群共有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筑建各族群共有精神家园打造文化共同体,通过加强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结成社会共同体等诸多举措,为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提供必要的内部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叙利亚全方位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叙利亚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特色及优势,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尽快地融入国际经济贸易和国际分工之中,由此保证自身能够共享人类发展成果。这些可以为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提供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Abstract Nowadays, the root cause of the ongoing civil war in Syria lies in the failure of its nation-state building. Pan-Arabism and Greater Syrian nationalism have seriously hindered Syria's nation-state building. Given this, this paper elaborates in detail on the localization of Syria's nation-state building, with a focus on looking deep into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in its nation-state buil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nationalism and its negative political effects, in a bid to provide a possible path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陈纪 副教授 郑静 本科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350)

(责任编辑:黄凌翊)

① 参见高永久、左宏愿《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民族政治整合》,载《南开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1期。

② 参见陈思《福山“国家构建”理论的背景分析》,载《江汉论坛》2014年第11期。